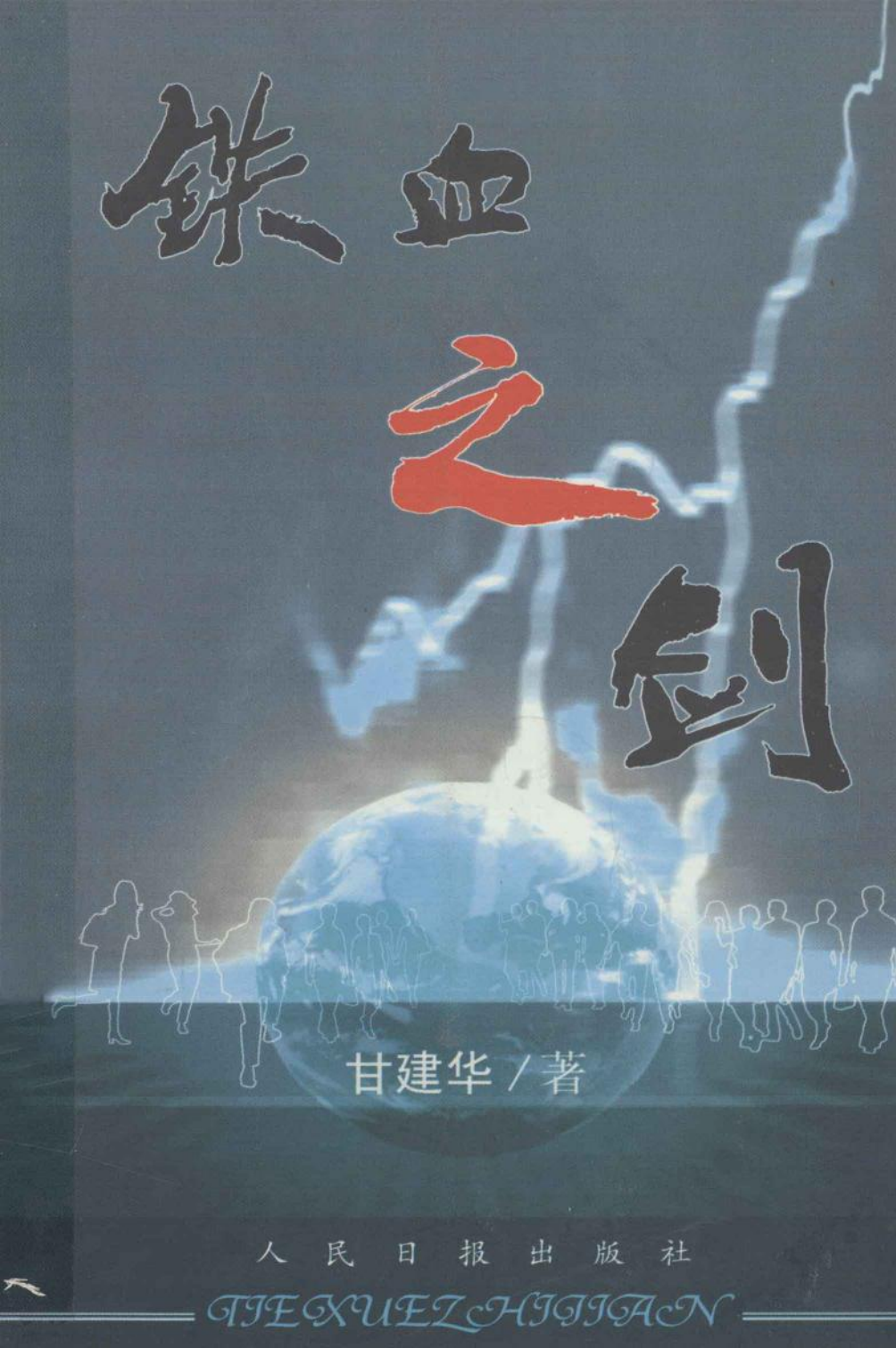


铁血 之 剑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blue-grey. A bright, jagged lightning bolt strikes down from the top right corner, illuminating a globe in the center. The globe is rendered in a lighter blue, showing continents and oceans. Below the globe, there are several white silhouettes of people in various poses, some standing and some walking, as if they are part of a crowd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The overall mood is dramatic and powerful.

甘建华 / 著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TIEXUEZHIJIAN

铁血之剑

甘建华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TIE XIE ZHI JIAN

甘建华 湖南衡阳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后在青藏高原柴达木大盆地从事新闻工作，并成长为中国西部文学一员骁将，1990年初获得“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1992年秋天调回家乡，先后三次荣立三等功，被授予“湖南省首届十佳青年记者”、“湖南省十佳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已出版小说散文集《西部之西》、长篇新闻调查报告《粉备忘录》、《江湖游医》等七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之剑/甘建华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3.5

ISBN 7-80153-627-4

I.铁… II.甘… III.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5680 号

书 名: 铁血之剑

著 者: 甘建华

责任编辑: 那 伦

技术编辑: 文 涛

出 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字 数: 408 千字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4.625

印 次: 2003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627-4/G·356

定 价: 50.00 元 (上、下册, 每册 25.00 元)

责任是成功的第一步

梁 衡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本书是青年记者甘建华的新闻作品集。我向来认为，一般记者大可不必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因为我们总难逃脱“新闻是易碎品”这个规律，将已破碎的瓷瓶收集并上架陈列，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欣赏。与其花这种无用功，不如赶紧去制作一件新瓷瓶。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当作品集中的作品是超出当时的人或事，而折射出作者个性的光芒或新闻原理的脉络时，这本集子就值得出版，值得玩味了。《天下好人》、《铁血之剑》就是这样的两本书。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讲做人的最高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讲为官的最高境界。那么做一名记者呢？这就用得上李大钊的那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天下好人》、《铁血之剑》这两本书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个地方记者是怎样地为了他的采访对象的自由和欢乐，而倾心事业，不避艰辛，不怕牺牲的。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也是记者所应具备的第一素质。有了这种社会责任感和第一素质，甘建华同志就获得了成功。

我曾经在基层做过多年记者，我一直认为记者工作是一个很特

殊的行业。由于使命的关系，社会给记者一个有利的位置，他既处在制高点，可以从宏观的高度俯视全局发现问题，又处在连接点，摸得着事件和人物的脉搏。他所享有的舆论优势，就是他凭藉社会舆论而保有的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这力量是对邪恶的鞭挞，是对阴暗的揭露和对正义的支持。甘建华《天下好人》第三辑“蒸发密令”和《铁血之剑》第二辑“警世档案”中，诸如《愤怒的好人》、《银行行长蒙冤六年六进六出公安局》等等，都是舆论监督的力作，实现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良好意愿。其中《愤怒的好人》是一篇亲历式的作品，曾在1995年度引起过广大读者的注目，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媒体都作了转载，报道中的主人公黄学农几乎成了一个特定的符号——做好事反而蒙受冤屈，这世上究竟还有没有公理？正是因了记者的敏感和责任心，促使甘建华下决心查清这一事件的真相。他连续几天几夜跟随交警进行调查，历尽千辛万苦，终使案情水落石出。也正是从“黄学农事件”中，甘建华以他的勇气和良知，让千百万读者感受到了舆论的力量和新闻工作的神圣，显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高尚职业道德。这就难怪衡阳一些干部群众受了冤屈，遭了不白，都要去找甘建华，请他讨一个说法。而甘建华总是善待人民群众，扶助弱势群体，站在正义和真理这一边。

在各种行业中，恐怕只有记者这一行是与社会前进节拍配合最紧密的。尤其是地方记者，常年驻扎基层，耳闻目睹许多民声世情，总有一种冲动要诉诸笔端，要为完成社会进步这个政治目标尽到一份绵薄之力。《铁血之剑》的第三辑“人命关天”，是有关医疗纠纷的报道。医疗纠纷是近些年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之一，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和正在逐步解决的问题。甘建华顺应党心民意，看准社会的脉动节律，通过自己的眼睛识别有益或有害的信息，用自己的笔抑恶扬善，启智杜愚。他自掏腰包，辗转大江南北，追踪曝光了近年一系列最具愤怒程度的医疗纠纷个案，把血淋淋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控诉呈现于天下，呼吁打开医疗事故鉴定的暗箱操作，呼唤卫生法和医事法庭的早日出台，切实尊重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对“张四莲事件”的关

注，他先后耗费了4年时间，连续写作了《张四莲，二十世纪的窦娥冤》、《衡阳秋菊打官司》、《救命岛上的荒诞神话》三篇深度报道，吸引了三湘四水乃至更大范围的注意力。他不仅从道义上支持张四莲，而且从经济上支助她，发动更多的人帮助她，使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命女人，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关爱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由此我又想到，一个人，无论他是做什么事情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甚至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时，他就不怕牺牲，就会自觉地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别人的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条件，竭尽全力地为社会作出贡献。而记者，就是最易完成这种崇高理念的人。当他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奋斗时，他的作品也就突破了“易碎品”这个界限。一个真正的名记者，在生活的海洋中，能够表现出一种曾经沧海的深沉和洞若观火的敏锐。不值得写的东西他看也不看一眼，值得写的东西他会磁石吸铁般不松手。他不会像一些平庸的同行那样追逐于明星歌手的裙裾后，陶醉于奇闻艳事的传播，浮光掠影，毛毛草草，他能吹沙见金，持之以恒，挖掘出新闻背后的新闻。我们的时代就需要这样的记者，而甘建华也正是这样的记者。

毫无疑问，甘建华是一个务实而有行动力的记者，他为他供职和供稿的媒体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有一个个具有穿透力的文本为证。《天下好人》中的《春风传颂跨世纪的爱心故事》，是甘建华追踪报道长达八年之久的“跨世纪爱心行动”。这不仅是对记者社会责任感考验，也是对个体生命毅力的挑战。《罹难弱妻背后有美丽爱情》叙述的是40年前的一桩旧事，但他不仅是将读者不易发现的问题的侧面转过来给人看，更主要的是进一步将读者不易看到或者说很难看到、几乎看不到问题揭示给人看，赋予了作品以全新的内涵。华人黄楚才是美国一家电脑公司的程序工程师，他在祖国如愿成功离婚，为何会引起在美华人的轰动并为之庆祝呢？《铁血之剑》中的《华人黄楚才海外婚变真相》是一则海外奇闻，它让读者看到在这场婚变的背后，一个中国男人为了捍卫个人尊严

的不屈抗争，以及美国主张所谓“平等”、“博爱”及其“人权”的真实嘴脸。《375次列车乘客挨打事件》讲述了“示范列车”上列车长率领列车工作人员集体殴打无辜乘客的丑闻。人民铁路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亟须引起铁路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绝对不能允许丑闻重演。我所点击的这几篇都超出了甘建华生活的地域，有的甚至涉及了国际问题，但又都与衡阳有关。这个被人誉为“天生就是干记者的”小伙子，敏锐地寻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为当时传递了信息，为将来留存了真实。能够透过表象看到实质，将思想升华至一个新高度，以天下、社会为己任，这是一个记者政治修养成熟的标志。

要承担“无冕之王”的社会责任，我以为除了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新闻敏感外，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不可或缺。没有广博的学识和文学素养，是当不好记者，写不出好文章的，因为这种能力与素质贯穿于记者的采访和写作的始终。记者学识和学养如何，是会影响到采访的效果和深度的。采访时记者问什么、怎样问，这是记者水平的体现。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甘建华显然知道，只有以学识、学养、经验、智慧为前提，才能实现与采访对象的沟通，找到谈话的“共同点”。尤其是采访一些有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或名人，记者的知识、学识、谈吐则是采访的“入门证”了。他的《天下好人》的第一辑“封面人物”，都是与衡阳有关的名人，举凡阿迪力、琼瑶、罗荣桓、夏明翰、刘新垣、李敬等，在浩渺的苍穹中都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他借鉴了一些文学的写作手法，运用高超的叙事艺术，使《南岳祝福维吾尔英雄美女》、《作家琼瑶的美好年代》等作品写得生动隽永，可读性很强，显现出勃勃的生机和久远的生命力。

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一个恒久弥新的话题。记者要在纷纭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新闻，而历史总是将那些凡人琐事风吹雨打去，只在转折处留下闪光的坐标。新闻作品的易碎易逝，正如流动的河水，我们虽不能使它静止于一瞬，但我们可以沿河泛舟，发现激湍的险滩，垂天的瀑布，总揽风光，并弄潮破

浪成为一名老练的水手。甘建华不但以大量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深度报道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同时作为第一个向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者发起反击并取得成功的记者，已经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新闻人物。在推进中国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他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并获得了人们的嘉许和认同。这就是我读了甘建华的《天下好人》和《铁血之剑》两本书后，感觉到的他的亲身体验和成功实践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2002年11月30日于北京

[梁 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调查性报道的惊世魅力

雷一火

调查性报道着眼于新闻的深度，着眼于新闻背后的新闻。在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因了一大批优秀记者和媒体的努力，使新闻在保持真实、客观、公正原则的前提下，获得了深刻与全面的阐释，调查性报道从而成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报道形式。

事实上，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界定，迄今尚未有一个准确的结论，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多元的说法。有称之为调查报告的——按照传统的新闻分类学，调查报告是有别于消息、通讯之类的“重武器”；有称之为深度报道的——它是相对于单纯客观报道而言的，呈现出一种立体的思维方式；有称之为特稿的——与消息相比，它有分析，有综述，有单独成篇的专稿，也有就一个专题从不同方面进行报道的组稿，新华通讯社就有一个专写特稿的特稿社；有称之为大特写的——它是相对于新闻特写的长度而言的；还有称之为纪实性报道的——它与报告文学不同，少了虚构的情景描写和合理的心理猜想。当然，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报纸，报眉上都赫然标着“特别报道”4个大字——它表明了这块版面推出的新闻事件的重大性、典型性，是这个版面甚至整张报纸的卖点，不看不行，非看不可。

就我个人的审美观来说，我更倾向于调查性报道的提法。按照

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的诠释：“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问题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是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揭丑报道，即专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化行为与丑闻的新闻报道发展而来的。它与一般报道之间的区别在于：一般报道只报道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注重挖掘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关系，并向公众分析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美国传媒学者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之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

在经历了广播技术、电视技术、互联网普及三次技术革命，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报刊如何走向市场，进入百姓家庭，已经成为哈姆雷特那个著名的“是生还是死”的拷问。由于调查性报道具有新闻事件的重大性，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共鸣，再加上写作手法的灵活性，作品具有丰富的细节，完整的情节，故事性较强，悬念频生，高潮迭起，其惊世魅力在新闻竞争中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媒介领导人的重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批优秀的新闻记者在这方面做出了艰辛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公正地说，要写出很有分量的调查性报道，对新闻记者的自身素质是要求很高的：既要有新闻记者的职业的新闻敏感，又要有富有才华的作家的写作才能；既要有关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满腔热情，又要有缜密犀利的哲学思辨能力。甘建华就是近年来写作调查性报道的佼佼者。他所结集的调查性报道——《天下好人》和《铁血之剑》这两部著作，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的丰富性和深入性提供了实证，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达到了一个地方记者所能达到的高度。

从最初的宏观方面关注社会变革时代进步，到后来的从微观上关注民生关注个体生命的质量，甘建华调查性报道写作风格的嬗变，实际上是他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回归。他注重事实，擅长叙述，顽强地坚守南方衡阳一隅，在没有新闻的角落，挖掘出了一座新闻的富矿，彰显了新闻工作在文明社会里所应

有的尊严和价值，让“新闻记者”这一金子般的名字，无愧于蒸湘大地和前进着的历史。他所有的爱与恨，所有的收获与舍弃，所有的荣誉与传奇，在继西部之西之后的又一个10年黄金岁月里，都交付给了“铁血记者”这个美名，交付给了《天下好人》和《铁血之剑》这样两本著作。他的灵魂暂时得到了安宁，而良心的声音和不倦的斗志，将激励他在更宽广的舞台上纵横捭阖，谱写出新时代壮丽的华章。

甘建华至今已采写、发表了百余篇调查性报道，其中在我们的《知音》杂志上，就有十几篇之多。《知音》的刊物特色就是“人情美，人性美”。美好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是我们倾心讴歌的对象；真善美与假恶丑在这儿激烈交锋，人性的矛盾冲突，往往掀起读者内心情感的波谲云诡。《知音》因而月发行量达到450万份，成为中国的优秀期刊，并跻身世界十强。正是因为拥有了如甘建华这样的星散全国的优秀作者，才筑就了辉煌灿烂的“知音大厦”。在这里，我要向他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衡阳少了一个好人》、《愤怒的好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好人》这三篇作品，共同指向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这年头好人好事还做不做得？在与非正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英雄或者好人的凛然正气，能否唤醒我们曾经冷漠的血液？《衡阳少了一个好人》是甘建华的成名作，他报道的主人公肖伟平，本来是无私救助离家出走的中学生，孰料这个中学生恩将仇报，用从担任政法干警的父亲那儿偷来的手枪，残酷地杀害了一向做好事的好人肖伟平。当有的媒体报道肖伟平“仅为150元车资而被杀”后，许多读者找到甘建华，请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甘建华凭藉敏锐的新闻嗅觉和深厚的社会阅历，对于这桩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真相隐藏在冰山之下的事件，走访了大量的证人，确定了大量的具有可信度的证据，终于还了好人一个清白，还了社会一个公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门彻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三层报道”概念。他认为，对事实表面的直截了当的报道是第一层报道；发掘事实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度的调查性报道是第二层

报道；在事实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基础上所做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为第三层报道。甘建华在完成了第一层和第二层报道之后，对英雄肖伟平临死之前夺枪救人的壮举，又进行了第三层的解释和分析——是见义勇为还是正当防卫？这个分析使这起新闻事件呈现出了真正的意义：一个普通的的士司机之死，竟然会有如此崇高和光荣——在衡阳市，肖伟平是二十世纪末的一个标高；在全国，随着数百家媒体对该文的转载转播，引发了一场“我们应该怎样做好人做好事”的大讨论。甚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新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条款时，《衡阳少了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典型案例。

调查性报道代表的是公众的知情权，它是公众利益的捍卫者。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调查性报道的地位是其他任何报道所不能取代的。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调查性报道是所有报道中的极品，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是记者中的骄子。”一篇成功的调查性报道，往往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为其所属媒介赢得巨大的声誉。甘建华的《375次列车乘客挨打事件》可为一证。成都开往广州的375次列车，是广铁集团命名的“示范列车”。2000年6月23日凌晨1点多钟，就在这趟“示范列车”上，因列车长查验车票与乘客发生争执，引发了列车工作人员集体殴打乘客，致使4名乘客不同程度地受伤。事件发生后，甘建华率领手下的记者即在第一时间赶到衡阳火车站，对挨打受伤的乘客和广州铁路方面进行独家深度采访。为了淡化丑闻，封杀传媒，广州铁路方面调动了湘粤两省各种关系，向甘建华软硬两方面施加压力，焉知甘建华铁骨铮铮，执意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在舆论强大的压力下，铁路方面终于低头认错，一次性赔偿了受伤乘客医药费和精神损害费。“受伤乘客在协议书上撤上了手模，印油鲜红的颜色，其实就是鲜血的颜色。”

调查性报道不再满足于向读者揭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它最关注的是“为什么”和“产生什么后果”上，藉此将读者带进他所关心的范围，告诉其重要的事实、相关的缘故以及丰富的背景材料，凸现出这起事件的新闻价值。在甘建华的《天下好人》和《铁

血之剑》中，基本上每一篇都是衡阳及其衡阳以外地方的读者感兴趣的题材，都是具有新闻学上所说的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新闻事实。而且，这些新闻事实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应该有一定的陌生感，因而又具有必读性。像《南岳祝福维吾尔英雄美女》这篇文章，说的是维吾尔族青年阿迪力，以他超人的胆略和不凡的技艺，在天下南岳向人类的极限挑战。他在雾雨之中，以52分13秒的成绩成功地从芙蓉峰与祝融峰之间一根长达1399.6米的钢丝上走过，而且未带任何保险设施，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英雄阿迪力高空走钢丝这件事，人们通过电视直播已经了解，但有关他的幕后新闻，比如他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他有没有女朋友或者他的妻子是谁，这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尽管阿迪力为了比赛已经拒绝了所有的采访，但甘建华凭着他的名气和耐心，还有金石般的真诚，终于打动了阿迪力和他的妻子，接受了他的独家采访。人们由此第一次认识了阿迪力的妻子、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依巴古丽，第一次听说了他们那惊世骇俗的浪漫爱情故事。

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示深切关注，体现新闻记者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这是甘建华调查性报道的一个显著特色。在甘建华大量的新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具有的人文关怀意识，帮助他与被采访者增进情感认同，将采访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好地实现了采访的目的。尤其在他对于医疗纠纷的采访中，人文关怀使他一开始就确立了尊重被访者的思想，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使采访活动不断深入。衡阳病休女工张四莲一生不仅经历了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而且无意间“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第一次医疗纠纷跨越了两个世纪27年时空，迄今尚未有一个公正的说法；一生遭遇了两次医疗纠纷，在贫病交加中不知生的意义。闻悉这一切，甘建华的心颤慄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张四莲的苦难和心酸难道真的与某些“白衣天使”毫无关系吗？假如是他们自己的亲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还会这样麻木不仁吗？医者的仁德和良知到底被他们丢在了哪里？在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采访之后，甘建华含泪写出了《张四莲，二十世纪的窦娥冤》、《衡阳秋菊打官司》、《救命岛上的荒诞神话》等几篇连续调查性报道，使张四莲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给那些草菅人命的庸医敲响了警世钟。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这样描绘他所处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身处改革开放风雷激荡的大时代，或许正是由于生活本身的严酷性与强烈的戏剧色彩，甘建华的调查性报道字里行间的震撼人心之处，与其大气朴实的笔调及写作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饶有兴趣地读完《天下好人》和《铁血之剑》这两本书后，我惊异于他敏锐的目光总是能触及事件的实质，并在调查性报道的分析中将事件的实质揭示出来。他了解这种报道体裁的每一种形式，甚至包括它的局限性，所以能熟练地运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新闻事件的一些场景和细节，使报道写得生动而有意义，有的简直就像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所不同的是，他写的全都是事实。就这样，甘建华敬业守道，一以贯之，由此成就了他的中国著名记者之路。

2002年11月16日于武汉

[雷一大，知音期刊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编审，著名编辑家]

福克纳给我的启示

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这样一幅图画：八十多年前，在地处墨西哥湾畔的新奥尔良，青年作家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拜访了“现代小说的指向路标”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后者读完他的小说后，携手同游芳香四溢的玫瑰园，说：“孩子，你必须要有有一个地方作为开始的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学着写。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害羞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端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你的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出来，虽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所知，你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就会坍塌一样。”“站在门槛上”的福克纳听完这一番话后恍然憬悟，深深地向他的导师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去，把笔锋从神话、“迷惘的一代”、半瓶子醋艺术家那里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写作了伟大不朽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走向了斯德哥尔摩领奖台。

正如后来的我们知道的一样，约克纳帕塔法郡是一个神话性和真实性的地方，以杰佛逊城为其郡府所在地，方圆 2400 英里，人口 15611 人。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来自于福克纳的想象。其实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福克纳家族就已定居于密西西比州，这里是美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作为美国南方的一部分，约克纳帕塔法郡在福克纳的笔下，确实有别于美国的其他部分，如西部、东部和北部。南方既有荣华富贵，也有残酷无情。南方充满了庸俗、卑鄙、不择手段和旺盛的精力。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郡的人们，背负着原罪的包袱，背负着它那遗传下来的烦恼和痛苦，这烦恼和痛苦源于他们的奴隶制度——为了让土地上长出可供牟利的东西来，强权者可以不惜奴役一个民族，毁坏一片原野，而他们的反应又是多方面的和特殊的。

担任过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邮政局长的福克纳，把约克纳帕塔法郡比喻成“一张邮票大的故乡”——这可是典型的邮递员语言。他在给校方的辞呈上写道：“假使我非要对每一个出出进进的买两分钱邮票的混蛋唯命是从的话，我才真是个混蛋哩！”福克纳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是雨季来临的时候，土地里含满了天空的泪水，美国南方充满了历史感，密西西比河开始泛滥。

福克纳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南方只是他的写作方式，他对南方熟悉，所以他需要南方为他服务。他创造着南方的世界，又甘心让南方的世界创造自己。写作对于福克纳来说，是生命的需要和生命的组成部分。可以为自己写作，是他一生追求的境界。他的想像力像蛇一样飞翔，从一种可能飞跃到另一种可能，以密集的文字把南方一网打尽。

福克纳在西方文坛上被看作“现代的经典作家”。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包括15部长篇小说及一大堆中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刻地探究了人的伟大与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人的内心中的恶魔等等。他那持续不断的创新，使他的作品达到了广袤的境地，超越了地理上和主题上有限的现实。他以神奇的想像力和丰富的塑造人物的能力，让人感觉到了美国南方那种热带植物的芬芳、仕女的脂粉、黑人的汗臭，乃至驴、马等牲口一起交织而成的环境，从而使密西西比州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地图中一个重要的陆标。

差不多是在 20 年前，我在西宁湟水河畔的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求学时，有人告诉我，要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绝对绕不过福克纳。那个时候，因为专业本身的限制，我对文学的热爱基本上处于半地下状态。第一次读《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集》时，那些突然而来的漂亮句式和华丽词语，让我遭遇了心中的一个梦和一团火。这个奇妙丰富的异域作家，这个叼着烟斗的美国南方老头儿，他的文字带有古老的音响，像猎人的号角一样。美国南方的哀愁和忧伤，就这样坚定了我重新回到中国南方的信心。

此刻，我置身于中国南方，置身于南岳山下湘江之滨的雁城衡阳。在冬夜雨声的淅沥中，我再一次阅读《福克纳评传》，再一次感激福克纳给我的神灵一般的启示。这是自西部之西之后，我再度迫不及待地走近福克纳，并且被他影响着我对于故乡衡阳的理解力和判断力。

“青杉翠竹是衡州。”衡阳，北倚南岳，南拥蒸湘，自古就流传着“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美好传说。这座具有 2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东汉科学巨匠蔡伦发明造纸术于耒阳，宋代鸿儒张栻、朱熹讲学论道于石鼓书院，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文学家王船山著书立说于湘西草堂，共和国元帅罗荣桓从这里走上从戎报国的革命道路，多少风流，不一而足。丰盈厚实的历史积淀和钟灵毓秀的自然景观，共同构筑了魅力独特的湘南明珠。

当我在最近 10 年时间里，深入到衡阳社会生活的最前沿，以自己的方式把握着通向世界的道路，良知呼唤我不懈地探索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忍耐力。尽管南方的风景也很打动人，但是，更能打动人的是南方的心灵。我在此之前对衡阳的坚守，期冀能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观察与思考，见证新旧世纪交替中人们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与时俱进的社会变迁。至于我本身具备的素质和努力能否达到战略眼光所及，这是过程以外的事情了。

甘建华

2002 年 11 月 26 日于雁城衡阳